

交流园地

我和上海水产大学

——一个日本水产学者的回顾和感想录

THE FRIENDSHIP BETWEEN I AND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MEMOIRS OF A JAPANESE FISHERIES EXPERT

真道重明

Shigeaki SHINDO

编者的话

真道重明先生是我国水产界的老朋友,长期来为中日渔业科学技术交流而努力,并作出贡献。早在1957年,真道先生作为日本水产学术界的代表首次访问了中国,并在我校讲授水产资源学,80年代以来又多次访华,几乎每次都来我校访问,热情地介绍国际渔业发展形势,就我国渔业提出建议。真道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大学前身——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后曾在日本农林省水产厅任研究官,日本西海区水产研究所底鱼研究室主任,又任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驻泰国训练部的主任,还担任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日本海外渔业协力团等代表,对我国有关项目进行考察。现仍任日中农林水产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真道先生撰写的《我和上海水产大学》一文由两部分组成,前部分是从1957年来我校讲学到90年代对所接触的人与事的回顾,后部分是对我国当前渔业提出个人见解。内容生动,意见坦诚,本文已征得真道先生本人同意,在此发表。

真道先生撰写的是日文稿,经孙玉洁副教授的努力,组织我校日语专业95届同学翻译成中文初稿,又经骆肇菴教授和乐美龙教授校审、定稿,其中部分内容有所删节。

1 序言

1.1 执笔缘由

我是在1957年8月到12月首次访问中国,首次接触了中国水产研究工作者和从事水产事业有关人士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尚不到十年,而日本也正在从自己身为亚洲人却对亚洲进行侵略的愚蠢行动所招致的战败废墟中从事复兴。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尚未复交。

由于东海和黄海是中日两国共同利用的渔场,当时,中国渔业协会同日本的日中渔业协议会已经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按照协定中有关学术交流的条款规定,第一步具体活动是派北海道大学水产系主任渡边宗重教授在退休之后同我两人作为日本水产科研人员,到中国进行了数月的访问。访问的具体内容是在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水产大学)对全国各地的水产专家讲学。渡边教授讲授淡水养殖技术,我讲授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方法,同时对中国各地的水产基地进行了考察。

回想起来这已是离今近40年前的事情。新中国的建设在几经周折之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和进步,这对于一个衷心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对中国怀如故国眷恋之情的日本人来说,真是从心底感到无限高兴。本文主要以对当时的回忆为中心,加上了其后多次访问中国的喜悦感情,以及对当前水产业发展提出一些拙见。一方面是为了留下一些历史记录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上海水产大学一些先生启发而撰写的。

1.2 我和中国

先讲些自己的琐事。还是在小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面向儿童的西游记——日语译本的《孙悟空》,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感到“真太有趣了”,将来一定要去读一下吴承恩的原著。这一愿望终于在1957年实现了——到上海后我得到了上、下册两本《西游记》,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

我父亲曾是一位教师,家里有许多汉语书籍,诸如元曲《梧桐树》等,虽然看不懂但仍然常常翻阅。在学校也读过很难懂的“子曰……”等四书五经,在家里读过中国的古典戏曲《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尽管年纪小,很多内容含义不理解,但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在一次次地阅读中,带我进入梦幻的世界。

我喜欢生物学,后来进入东京水产大学的前身——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学习,专业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养殖科。在学习中,我就感觉到中国在水产养殖方面的发展潜力在全世界是最大的。这不是出于对中国古典空想主义的梦幻,而是从现实的向往出发,很想去中国从事养殖业的发展工作。尽管当时在日本学汉语的人很少,但我仍然在白天学水产,晚上则到东京外国语大学夜校的专修班学习北京话。我记得学生时代还曾读过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林书颜的有关小黄鱼的论文等。由于错误的历史教育,我对日军在中国的行为和国际形势都一无所知,我在中国发展养殖这一朴素、单纯而又幼稚的想法,随着日中战争的愚蠢行为而化为泡影。我学的汉语也一无用处而被搁置。现在在这所学校(东京水产大学)有60多名学水产的中国留学生。在当时曾有过我的一些前辈,后来在中国照料过我的王贻观、黄文洋等,还有一些是我的后辈,如郭沫若院长的儿子(指郭福生先生,译者注)等,都在该校学习过。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于1957年决定派遣我以日本政府公务员的身份首次访华。心中所想的不仅是学术交流,还怀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同时,我内心还在想也许可能看到《西游记》和《西厢记》的戏吧,心潮起伏不平。

1.3 新中国建国后最早去中国的技术访问者

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其所以能作为两人中的一人被选中,是因为我在长崎的日本水产厅所属的西海区水产研究所从事东海鱼类资源的研究工作,并担任该所东海底栖鱼类研究室主任。这样,我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以日本中央政府职员的身分最早访问中国的人员。

当时,因两国还未复交,日本外务省也没有经验,连一份一般的出国命令也没有发,只拿到了一张从无先例的命令,上面写着“出差香港,再从深圳入境,但不支付旅费”。再在香港领到“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许可证后,才得以从香港新界进入深圳,开始了对中国访问。

那时,我返回日本后的好几个月还受到警方的监视,令人很不愉快。现在看来,只能成为笑话而已。当时对官民都有一条不合理的规定,日本政府一面命令去他国出差,一面又秘密监视回国后的行动。当然,日本政府对于到共产党领导而又尚未与日本建交的国家去过的人,“是否被洗了脑子”这一恐惧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批准出差的行政部门与公安部门虽同属政府机构,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是很强的。

我和渡边宗重先生从日本出发前,在东京学士会馆曾为我俩举行了送行宴会。著名的评论家中岛健藏、世界上养殖对虾最早取得成功的藤水荣作以及很多的产业界人士出席。当时能去中国访问,无论对我们两人或者对日本的水产界来说,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目前,各方面的水产界人士之间相互交流已是十分普遍了。但当时,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才听说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还是首批被邀请的外国水产专家。因此,我们两人在中国所会见的人士彼此之间都留有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上海水产学院所见到的朱元鼎、骆肇尧、费鸿年、王贻观、黄文洋、曹正之等前辈。在那以后有机会在中国各地或东南亚相见时,都还能想起往年的情景而彼此紧握双手。但现在去世的已不少,除了骆肇尧、曹正之等先生以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1.4 第一次访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心情

我对中日两国在其他领域内的学术交流不了解,但在水产领域,双方都是首次,所以相互印象都很深刻。当时的另一种心情是想亲眼看看社会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念书时上的是水产技术的理科学校,但文化修养课程方面读过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原理。也许现在的日本人不会相信,战前的日本政府把苏联作为假想敌人,把反共作为国策,在大学里怎能进行这样的讲课?事实上,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的笔记本。也许是政府当局认为只要不进行政治活动,单只是理论上讲讲也无所谓吧!

象我这样读理科的,对此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知道一些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经济学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因而加强了我对中国的关心。加上我是1922年出生,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几乎是同一时期。因此,到社会体制不同的中国去访问,虽不能与《大唐西域记》的唐僧的心情相比,但在我心境中确也有过一些与唐僧心境相类似的东西,这是现时日本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

2 去上海水产学院途中

2.1 进入深圳,第一次看到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初次访问中国是1957年夏末至初冬,踏上中国国土给我留下第一印象的就是深圳火车站。与现在不同,当时广州市与香港之间没有民航线,人们往返深圳和香港间只能自己提着行李徒步过桥。车站里红旗林立,解放军持枪站岗,那时我真正感到了“我现在已经进入新中国了”。在那里,感受到了与香港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

车站长说,“深圳过去只是一个小山村,现在已经成为同外国相通的唯一门户,你看多好”。车站并不很大,但打扫得很干净,二楼还有外宾用的食堂。那时的深圳现在已成为现代化高楼林立的大深圳市,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不知那个车站长要是看到现在的深圳,该作何感想。

2.2 到北京、去上海

中国渔业协会特意派人到广州来接我们。在广州视察了国营南海渔业公司后,直接到了武汉,参观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附近的养殖场。正巧是长江大桥开通的前夕,一周后可通火车,没能看到曾在唐诗里所读到的黄鹤楼。多年以后再次访问时,黄鹤楼已重新按照原有风格予以修复,但规模要大得多,成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公园。

到达北京时离国庆节还有两周。我们在北京等着过国庆节的期间,曾去过大连。在北京,对曾会见过的中国渔业协会主任杨煜先生及水产部部长许德珩先生表示了敬意,参观过中科院动物所。还记得与中日友好协会首任会长廖承志先生等人一起就有关科学技术论文的中文表达方法促膝畅谈了2个多小时。在东京日中友好协会的大楼内就有廖承志先生的半身像,只要一看见他,就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些事。

国庆节,我在来宾席上望见了毛主席。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毛主席高喊“同志们万岁”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响。当时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建成,晚宴在北京饭店举行,周恩来总理来到我们桌前祝酒,共同干杯,我感到十分光荣,宴会上还看到了彭德怀元帅。

去上海的途中,还参观了青岛的黄海水产研究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山东大学水产系,碰到过研究海带养殖专家曾呈奎所长,鱼类学家成庆泰和甲壳类专家刘瑞玉等很多先生。

3 在上海水产学院的日日夜夜

3.1 听讲人员

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次邀请外国专家去讲学,听课者都是在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在研究和生产实践中有经验的年轻技术人员,后来又增加了些大学生。

为了解决语言问题,专门成立了翻译组。为我担当海洋水产资源调查方法讲课翻译的是王贻观和黄文洋

两位先生。他们在日本留学时,都是我母校的先辈,我觉得麻烦他们很不好意思。翻译无疑是很正确的,渡边宗重讲授淡水养殖,是由骆肇尧先生担任翻译的。

因为我对汉语多少懂一些,因此很关心翻译的内容,对翻译不当之处及时纠正。对当天讲课内容也都一一校对。在工作中,我还得到当时还年轻而且锐气十足的王尧耕先生极大的帮助。这本记录的誊写版分为上、下两册,直到现在我还留作纪念,一直保存着。

3.2 授课内容

讲授题目是水产资源的调查方法。我是根据日本水产研究所和大学的有关教材讲授调查方法的基础理论、调查器材和具体范例。后来一定要我讲取样调查理论和有关近代统计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虽然这些都不是我所研究的领域,但我还是接受了讲授这些内容。

当时,渔业资源分析正处于从单一理论向完善系统发展的过渡期。MSY 理论也在被论证的过程之中,以 Beverton-Holt 型理论模式为基础的网目限制理论尚未发表。

不用说,当时使用的还不是现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电脑。我介绍了日本对资源调查的大量的数据处理,所采用的手动式计算机、卡片分类装置等设备的使用方法。

当时苏联盛行米丘林学说,在水产资源学方面,尼科里斯基等也相当活跃。尼科里斯基在我来上海之前已经在北京进行过为期一周或十天左右的非正式的短期讲课,题为“滥捕理论”。听说那时他使用的教科书是英国拉塞尔(Russel)写的《滥捕问题》,这本书叙述了西欧资源学入门和西欧资源学的发展史,我曾把它翻译成日语出版。

在西欧与北美被评价为“资源解析理论鼻祖”的俄罗斯的米高扬渔业工学院的巴拉诺夫的论文,因为是用俄文写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欧北美还不知道。后来才发现,欧美的生物学家力争想解决的问题,巴拉诺夫早已用数学模型理论解决了,这是该论文受到高度评价的一个原因。正因为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好评,所以在苏联受到了批判和忽视,现在再也没有这种议论了。但在当时还有些学者把苏联派资源学与欧美派资源学对立起来,照理讲讨论生物物理理论模型应该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存在着这种对立的当时,苏联的尼科里斯基采用上述英国书籍作为教本多少感到有点意外。事实上这本英国书出版时,英国还根本不知道巴拉诺夫的名字和他的理论模型。

谈到这里,也想到淡水养鱼技术的陶朱公《养鱼经》以及有关水产资源保护的《孟子》的第一篇和梁惠王篇的第二章中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论述。我想这应该是不是世界上告诫人们不要只为追逐利益而过度捕捞的最古老的文章呢!

3.3 日常生活

3.3.1 从上海大厦到学校

当时学院的地址与现在一样,在军工路上。但现在校舍已被许多漂亮的大楼所代替,有的还在扩建中。我的私人办公室,是安排在离图书馆较远的地方,住宿在上海大厦的12楼,当时上海大厦12楼以上的各房间都住着苏联和北欧的科技工作者。

现在的上海以虹桥机场为中心,大型的现代化饭店鳞次栉比。可在当时,上海大厦是一座唯一的高级饭店。我每天都从那里乘大型汽车到学校办公。

3.3.2 大字报

在新中国有大字报的事,在日本有过报导,所以是知道的。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字报是在学校告示板上。一连几天,告示板上全都是大字报。午饭后休息时间看大字报成了我在学校里每天的课程,有些地方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有些毛笔字写得很不错,有的还写着“他虽是候补党员,但他行动很随便”一类责备的话,我想要成为一名候补党员是很不容易的。也有“某某老师今年的讲义内容与去年的完全相同,没有进步”,我想这跟日本倒差不多。在日本虽没有大字报,但日本学生讲的话同中国学生一样,使我感到很有兴趣,想起我在学生时代一位有名的植物学老师。一天有个学生对老师提出了与那张大字报一样的意见,记得当时那位老师怒喝道:“别说傻话。今年花开的机理当然和去年一样,是没有变化的”。

还记得当时好象有上海水产学院与山东大学水产系合并的构想,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每天都不少,大字报

上议论纷纷。

3.3.3 校庆余兴

我在水产学院还欢渡过校庆。校庆典礼是从早晨开始的。中午有朱元鼎院长关于中国捕获的板鳃类的学术报告,题目是“珍奇的鲎类”。晚上回到宿舍还余兴不减,学生中有上台做滑稽表演的,还有请来说相声的。说的话稍微有点明白,把当时中国流行的电影片名连起来说,这种相声艺术与日本的“漫才”相似。其中还有许多日本电影名字,例如《二十四只眼睛》、《米》等,也许正巧在北京刚举行亚州电影节。在中国竟这样了解日本电影,颇为吃惊,当时在日本几乎不放中国电影。校庆的气氛与日本学校差不多,很相似。

3.3.4 寺院与戏曲

象星期天这样的休息日,承学校特意安排,参观一些有名的寺院或者看电影。渡边宗重先生上了年纪,对佛教寺院感兴趣,参观了苏州寒山寺等十几个寺院。对我来说,感兴趣的是不管哪个寺院,正中都是大雄宝殿,其背面则是大的壁画,上面有像西游记中的南海观音和红孩儿变的善财童子的场面,象这样的装饰在日本的寺院是根本看不到的。

我喜欢中国戏曲,因此经常去剧场。渡边先生对戏剧虽不感兴趣,但一起去。这对渡边先生来说,可能感到锣鼓声太噪,不习惯,但对我来说,是想去看的。理由是,我在日本学中文的时候,北京出生的朱老师对京剧很熟悉,在宴席上必定要唱一段。另外,曾和我住在一起的一位低年级的北京人十分喜爱京剧,常演奏笛子、二胡,这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知道了中国戏曲与日本的“能”、“歌舞伎”之间有着很深的关系。因此,我常去看京剧和越剧。学生时代,在日本只能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名角马连良的声音。来上海前,在北京能亲耳聆听,令人十分激动。

3.4 中国的两所水产院校

当时在中国,作为水产业的最高教育机构,有上海水产学院和山东大学水产系。山东大学在我访问后两年,迁到济南。海洋和水产仍留在青岛,改名为山东海洋学院,我们访问的时候曾谈到过和上海水产学院合并的事。后来听说文革中上海水产学院迁到厦门,1979年才迁回上海原址。两所学校在历史的动荡中都似有过一些曲折迂回的经历。

在1957年,这两所学校为充实图书尽了很大努力。另外,与人事费相比较,研究费和买图书的费用相当多。这虽然同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不同有关,但与日本的年度预算中用于人事费的情况比较起来,当时我非常羡慕中国的学校。

当时图书馆中,日本出版的许多水产方面的科技图书差不多都有,并且同样的书有好几册。另外,研究所和大学里有一批翻译人员在情报室或在图书馆承担国外技术情报和文献的翻译工作,也很令人羡慕。在日本,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没有这样的职员。

由于大学的关系,认识的人很多。我还记得,山东大学水产系的张定民和闵菊初两位先生,在青岛常与海洋所和黄海所的人一起工作,最近听说张定民因车祸已故世。因在上海水产学院(现在是大学)讲学,并住了两个月,和很多人成了知心朋友。那时,东海水产研究所还没有成立,后来水产学院建立了水产研究所,再独立成为现在的东海水产研究所。

这种经过和我的母校东京水产讲习所(现在的东京水产大学)非常相似。以水产立国为目标,明治政府向欧美派遣许多学者回国后,又从日本最高学府的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招聘了许多教授,设立了农商省管辖下的水产讲习所。名义上是水产讲习所,实际上是相当于中国的学院。并在它内部成立调查部,再独立成为农林省管辖下的中央水产试验场。中央试验场在二次大战后,改名为东海区水产研究所,1993年从东京的月岛迁到了横滨,成为现在的中央水产研究所。

4 回忆1957年见到的各位先生

4.1 朱元鼎院长

朱元鼎院长的名字,在见到他以前,已从有关鲤科鱼类的(研究)著作中就知道了。对他的第一印象感到确

实是一位从事研究工作十分严谨的老师,有空的时候,常常把我们带到标本室进行亲切的介绍。

当时他正忙于板鳃类的分类研究。记得在我逗留期间举行的校庆活动中,朱先生用通俗的语言,以“中国珍贵的鲨鱼类”为题,给全校学生作了鲸鲨的报告。1983年,我参加无锡的FAO国际会议的归途中,顺便访问阔别了二十年的水产学院。朱先生还健在,住在校内的家属宿舍。因年事已高,没能见面,后来听到朱先生逝世的消息,非常悲伤。以后,我访问东海水产研究所时,参观了学校特地设立的朱先生纪念展览室,瞻仰了故人的伟业。他女儿在大学担任财务工作,曾向她表达了悼念之情。

4.2 骆肇尧先生

骆肇尧教授在京都帝国大学专攻过化学。当时他担任渡边先生讲学时翻译工作,在专业方面彼此没有接触,但他给我们讲过中国方面的许多事情,他那缓慢流畅的日语给我一个象遇到了日本的大学老师那样的印象。骆教授是四川人,听说后来他担任了该校的负责人,退休后,仍住在校内宿舍。1986年以后,我多次访问上海,他每次都精神矍铄地热情接待我。曾经同曹正之先生一起在上海机械学院宿舍里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知道我喜欢京剧。1991年我住在水产大学招待所,他常来我处,从昆曲谈起,一直谈到了中国的戏剧历史,还有日语汉字发音、中国方言和古代发音等有趣的话题。去年见面时,在远洋渔业培训中心宿舍一起拍了照片,尽管他比我年龄大,但听说每天早上都在锻炼身体。

4.3 曹正之先生

1957年在北京水产部见面以后不久,被任命为上海水产学院副院长,他对我非常亲切。1987年,我去东海水产研究所时,他同水产学院的骆肇尧先生一起到我住所来看我,渡过了一个回忆往事的愉快夜晚。

曹正之先生尽管已经高龄,但对在北京的往事记得很清楚,谈话偶尔讲到有关吟江南的唐诗,我说我很喜欢杜牧《清明》的诗。骆先生就吟了以“千里莺啼绿映红”开头的杜牧的《江南春》。曹正之先生马上就拿笔写下了这两首诗,下面写着“……谈起江南风光时,真道重明先生与骆肇尧教授共同背诵了这两首唐诗,曹正之记录”。这张纸,我现在还珍藏着。第二年的1988年访问时,还带我参观上海植物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现在他还很健康吧。

4.4 费鸿年先生

后来就任南海水产研究所所长。1957年我到北京后,在上海讲课和在学会上的讲演等,他都给我很多关照,并且在逗留期间和王贻观、黄文泮两位先生一起进行过很好的交流讨论。他曾来日本留学,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

1983年,我出席FAO无锡国际会议后的归途中,顺便去广州,得到二十多年后再相会的机会,我回到泰国曼谷就寄来了誊写印刷版的近著。虽然已经高龄,还是一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令我非常敬佩。

1986年再度访问的时候,他身体有些虚弱,要靠人帮助才能坐下,但脑子非常清晰。介绍了最近的学术情况,还说到正在执笔撰写有关网目规则,也谈到过在上海的往事,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费先生流畅的日语使我吃惊,以往好象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日语。

1989年我参加了世界银行关于渔业发展贷款项目的广东省调查团,几次访问过南海研究所。考虑到费先生高龄和身体问题,未去拜访过。以后,就接到了讣告。一生致力于水产研究的费鸿年先生是中国水产研究的大力推进者之一。

4.5 王贻观先生

已故的王贻观教授身材魁梧,常带笑容,令人难忘。1957年与费鸿年先生一起到北京初次会面。王先生在日本留学,他与黄文泮两人都是我母校的老前辈。日本水产学会创始人之一、已故的日本著名水产学者田内森三郎先生承认他的才能。他在“日本水产学会志”上发表的论文《濑户内海的真鲷标识放流结果的分析》,恐怕是该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外国人的论文。

当时(1957年),我把在上海水产学院拍的照片给田内先生一家看时,都说这“是经常来家玩的王先生,看到他身体很好,比什么都好啊”!一家人热泪满眶非常高兴。据说王先生是生在福建,笔名中有一个“闽”字。因是同一母校毕业,万事都很亲切,回想起他悠然的风貌,现在只能祈祷他的冥福。

4.6 黄文泮先生

担任过福建省水产局局长和顾问的黄文洋也是我的前辈。他那挥舞双手、摆动着身子、大声活泼讲话的姿态令我至今难忘。在大学讲课时,与我同一专业的王贻观和黄文洋两位前辈为我翻译操劳,很是过意不去。

后来,我在泰国曼谷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工作了十一年。那时,黄先生作为福建省赴东南亚渔业考察团长来泰,再次相会,都很高兴。尽管他年事已高,但精力仍很充沛,摆动全身和挥手讲话的姿态仍没有变。在中国沿海各省中,唯有福建省我没有访问过,尽管他邀请我一定要去,但不幸就是那次以后再没有见到,最近才知已经仙逝,深感哀痛。

4.7 王尧耕先生

现已是上海水产大学海洋渔业专家。当年还相当年轻,上进心很强,在我讲课时得到他很多方面的照顾。记得讲学的休假期间一次同往苏州参观的归途中,曾一起谈论过苏联、东欧和欧美资源学的对比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的资源学是曾经吸收过欧美的流派。我和王尧耕先生两人在车中交谈得很热烈,一转眼就到了上海车站。那以后屡次访问上海,都与王先生会面,看到在以往王先生的照片是那么年轻,现在和我一样增添了白发。得知他还继续上船调查,身体很好,值得庆幸。

4.8 曾呈奎先生

在见到海带养殖专家曾呈奎先生以前,我们专业虽然不同,但在有关文献上看到过曾先生名字。我在长崎西海区水产研究所工作时,一天有人拿来了漂到岸上的海带苗,据渔民们说经常发现这种海藻,经鉴定确是海带。但日本只有北海道才有海带,因而,曾一度成为议论的话题。随后听说中国正致力于海带养殖,并查过一些文献,所以知道了曾呈奎的名字。

以后,1987年我访问上海东海水产研究所期间,曾访问过青岛。曾先生是名誉所长,脸带笑容,不顾高龄出席了欢迎会。这使我回忆30年前他在装有许多萤光灯、象工厂一样的实验室内,给我们讲解海带养殖研究情况时的情景,令人难忘。

4.9 许德珩先生

当时中国政府中水产独立设立一个部。许德珩任部长,相当于日本大臣的职位。在日本像我之辈与大臣交谈几乎是不可能的。1957年离开日本时,是我成为国家公务员(中央政府的官员)以来第一次进入大臣的办公室。在很森严的气氛中,与大臣官房长及水产厅干部一起作去中国的告别拜访,当时的气氛,如果说得过分一点,真有点象清朝时代的仪式。

但是,与许部长会见时的气氛,却与日本的完全相反。许部长与端茶送水的勤杂工平等交谈,一点没有架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渔业经济的一书中看到了他的题词,使我回想起上述的往事,听说他致力于经济研究,又长寿,直至近年才去世。

4.10 杨煜先生

到了北京,最先进行礼节性拜访的是杨煜先生,是中国渔业协会主任,看上去很年轻。当时我们碰到了“聘请外国专家的经费处理办法”中有关规定的问题。但中日两国事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双方都没有经验,彼此不够了解。但由于杨煜的明快决断,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也避免了停薪数月的处分,才松了一口气,杨主任的决策实在难得。1991年在上海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偶然听到北京农业部的人讲,杨先生在北京身体很健康。

4.11 高树颐和其他各位先生

我到北京时,高树颐是中国渔业协会的副主任,总是戴着人民帽,讲话声音响亮,挥动手臂,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他和王云祥一起带着我们参观了北京各地。几个月后,我们离开水产学院回国,他也很客气地从北京来上海送别,很不敢当。

当时碰到的中国渔业协会的人,还有旅大市的田禾分会主任、郑芳斋、周瑞之、青岛的侯连三、王荣亭等,在我的记录中都有他们的名字和照片。

5 改革开放后的旧地重游

1957年的回忆是本稿的主题。1983年我出席了在无锡召开的 FAO/NICA 的国际会议。接着,1986年以后

因中国方面的多次邀请,日本及FAO的派遣,使我幸运地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几乎每年去中国访问的机会,旧地重游见到了不少老朋友,也结交了新朋友,是值得庆幸的。

5.1 上海水产大学

30多年前讲过学的上海水产学院,现在改名为上海水产大学。过去我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印象很深,现在校园内新建了不少校舍,但到处仍留有过去的影子,只是巨大的毛主席像是过去没有的。见到的老朋友中骆肇尧先生已经退休了,但现在仍在参加教学科研活动;渔业捕捞方面的王尧耕先生仍在现在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大家身体很好,很高兴。新近认识的人中有乐美龙校长,浙江人,待人总是笑脸相迎。他和日本前水产厅次长恩田幸男相识。我访问水产大学临行前见到恩田幸男次长时,他说:“请代我向水产大学的乐美龙校长。以前他担任行政工作,在中日政府间的渔业会谈上,与他曾经有过大的争论,那是工作上的问题,请转达我个人对他的敬意。”

当我把这番话转告给了乐校长时,他会心地一笑说:“我本人与恩田次长一样,当时双方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进行争论的。现在恩田先生作为日本栽培渔业理事会的理事长,正在努力进行与中国方面的技术合作,请转达我对他的感谢。”他们两人的高尚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5.2 东海水产研究所

在东海水产研究所我结识了不少朋友。曾应现已退休的赵传细先生的邀请,我数次访问了那里的资源研究室。每次到上海都是赵先生出面接待的。还有原情报室主任缪圣赐先生,精通日语,现在已退休,但是常到研究所照料工作。他对日本各方面情况十分了解,他在发展中国水产界和日本各方面的友好关系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赵传细先生对发展中国水产有许多见解,为人非常稳重,他 very 希望能发展东海沿海的海水增养殖。我们一起参观了浙江省三门湾、辽宁省、山东省,交换了许多意见。他知道我喜欢唐诗,送我《唐诗鉴赏辞典》,至今还保存在我房间的书架上。

5.3 北京

1983年以及1986年后,应中国政府的邀请,随同日本海外渔业协力团(OFCF)的渔业考察团和FAO、世界银行调查团等数次访问北京。访问目的不同,接触的人也就不同。同原水产司司长余大奴先生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谈话的中心是我在东南亚期间的体会及水产教育问题。余先生非常坦率而又委婉地谈了自己的设想,他在谈话中希望知道的问题,我在上海的农业部远洋渔业培训中心的讲课中稍有所涉及。

5.4 青岛海洋研究所

1957年在海洋研究所见过面的刘瑞玉先生,1986年再见时已任所长。我们在泰国的曼谷、马来西亚的首都又见过面。应他的邀请,我再次访问了青岛及全国各地,当时同行的还有带鱼分类专家李春生先生。以后也经常通信,并在信的末尾常附上一两句日本和歌(短歌),他对日语深厚的造诣使我惊讶。我说:“李先生比日本人还精通日语。”他回答说:“您看上去象归国探亲的南洋华人。”

6 对中国水产工作的感想和意见

以下是我这些年在接触中国水产工作中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如果能多少有点帮助,我感到十分荣幸。

6.1 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提问

1983年,出席了在无锡召开的FAO亚洲养殖会议后,回泰国曼谷的途中,我单独行动,为了访问想念的水产大学到了上海。水产大学的校门仍然保留着三十多年前的风貌,十分留恋,我冒昧地作了以下提问。那是距今11年前的事情了。“26年前来访,在贵校逗留期间,从贵国水产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计划来看,单纯按1950—1957年间的水产品增长率推测,总产量至少可达800万吨。但实际现在只有500万吨左右。请问现在低于我推测的数量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立即得到的回答是:“要扣除文革十多年的空白期。”不错,如果这样考虑,现在就是500万至600万吨了。

不用说,对于产量增长的预测,象我那样用单纯的外插法计算太简单了,它应包含很多因素。事实上,文革期间,生产没有停止,还略有上升。因此这里应包括文革前后生产的停滞、下降等的迂回曲折的影响,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奇怪的是,计算十年的空白所得的产量数值也大体不差。同时也听说该校在文革期间被迫迁到厦门,使教育活动也基本处于空白,当时我也曾想知道文革对于这方面有些什么大的影响。

6.2 关于研究情报的问题

从一个研究者的立场来看,我对中国日常感到问题之一,有关统计和研究情报的分发及情报共有制度办法的问题。在资源研究等方面,给研究者提供重要的统计情报或者情报的共有以及研究情报的交换制度办法还不够完备。

也许现在比以前完备多了。但1986年在青岛海洋研究所问及这一问题时的答复是,“其他海区的统计资料是由同地区政府机关统计单位编制出版的,需要时可向这些部门购买”。研究所和大学没有购买统计资料预算,也就拿不到统计资料。不属于政府机关的民间企业,需要时按价购政府出版物是可以的。但是政府机关内部所属研究人员需要的研究统计情报,统计编制单位似应有责任在一定范围内免费供给。即便是政府内部实行独立核算制,在必要情况下,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似更有效率。

更重要的是建立各种情报的共有制度办法。即使在日本,几十年前,研究者和行政负责人都不把自己手头的情报说成是“私有”而说成“私藏”,在当事人的人事变动时一般惯例不交给后来者而自己留下。这样在行政负责人的场合就容易产生:“这是前任者任期内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负责”的说法,使后任可以逃避个人责任。

作为政府机关因为部门的交替而逃避责任的事,被舆论指责为该部门的玩忽职守,所以采取了改进的措施。

研究者的情况与行政负责人不同。研究者从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竞争意识出发,本人所有的文献或情报一般不愿意他人看,具有强烈的知识财产私有感。

现在很多的研究不是由个人进行,而是采用“项目小组”、“研究小组”的方式,这样一来就变得不太允许情报私有了。谁都可以自由地看同事拥有的情报,也就形成了共有。另一方面,规定在农林水产省内部的“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上,从全国中央政府的水产研究所到县厅政府的水产试验场,所有研究人员都有义务每年报告一次研究进展情况,并将报告编印成册,作为内部资料免费发给政府所属的研究人员。这个制度30多年前就建立了,对研究的发展非常有用。

我在曼谷,就曾有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法国水产学者问我“为什么日本的研究者对同领域的其他研究者的工作内容在还未发表之前,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不知道上述的制度,我作了解释。她问我:“为什么很了解日本的情况?”我说:“我是日本人。”她说:“怪不得,在法国没有这种制度。”

中国是否应该用什么方法探讨一下情报共有的制度或办法的问题,如果是特殊的内容,对一般社会公开有问题,也可以作为内部资料,只在有关人员中分发。随着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时研究成果被看作商品。附属于公司的研究机关,有时情报被作为企业秘密处理。对此,在政府机关、国立院校、国立大学、中央政府似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研究人员给予帮助。

6.3 在经济开放下研究工作者的学科领域问题

研究工作的学科领域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策可分为“阳光”照得到的领域和“阳光”照不到的领域。不用说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可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领域。基础研究不用说,即使是应用研究,也会出现一些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得不到优厚待遇的领域。

例如在日本,50年前的捕捞渔业技术领域,由于相关产业的活跃发展,捕捞公司得到的利润多,新技术开发的需要多,因此研究者可能得到的预算经费也很多,他们歌颂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但以后随着资源的破坏出现了问题,一方面由于捕捞公司的收益下降,另一方面海水养殖的盛行,“阳光”照得到的领域由捕捞技术转向了养殖技术,如今养殖技术者很受欢迎。

研究人员的培养需要很多的时间、劳力、经费,简单地改行到其它领域,对那些积累了研究经验和上了年纪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中,随改革的深入,我想社会要求的专门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谁都想从事“太阳”照得到的领域工作的话,整个研究体系就会跛脚。不要用近视的眼光去考虑中、长期计划,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预算不足这一现实,我是了解的,但作为一个好心人,对此表示担心。

6.4 预算不足的对策

研究活动同军队一样是经济消耗非常大的活动。在应用研究领域,有时靠实验阶段产品的销售,可以得到收益。但是,这总是副产品,不是目的。如果在预算不足和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短期行为,把这种收益纳入研究预算,必须小心注意。

日本在战败后由于预算不足,因此地方政府对其下属的研究机关,曾采取过上述方法,结果完全失败。研究者的痛苦经验是“为收益疲于奔命,而忘记了他本来的任务是搞研究。”研究者即使为收益到处奔跑,结果还是“外行人(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做生意,”去与经营公司有经验的公司干部和商人的竞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政策对于国家整体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6.5 产量和质量的问题

产量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提高是经济的基本问题,产量不用说是重要的指标。但是我想是不是过分地重视了“量”,即重量的指标。即便水域中生物学上存在有1亿吨的有用资源,但如果不能捕起来进行利用,那么在经济学上也等于零。生产现场即便有10万吨鱼的产量,如果其中能利用的只有6万吨,那么在生产上毋宁讲6万吨更有意义。

产品折率、商品价值、附加价值、销售价格等各种指标,和“重量”同等重要。生产不是目的,利用生产物才是目的。我想这样的事情,用不着议论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之所以谈及这点,因为在许多交谈和记述中都只是谈及数量,不涉及表示利用程度的各种指标。“要重视质量”这句话现在叫得很响,我完全赞成,并有同感。

6.6 加强加工和流通的问题

前几年,我因有关世界银行贷款的工作,我曾到广东省的主要海洋渔业基地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我的主要任务是资源,虽是门外汉,在同有关加工、流通的专家们接触经验中得到的印象是加工流通所谓“后勤”方面的环节很薄弱。

也许是历来过于把增加生产第一线(前线)产量作为主要目的,因而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场产量上,结果导致了水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整体失去了“均衡发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广东省的许多负责人都有充分的认识,问题在于今后该怎么做。

在产地即使产量增加,生产的数量多,如果收获、贮藏、运输、销售等方面的体系不完善,好不容易得来的产品的社会效益就会降低。某些地区淡水鱼得到增产,但是卖不出去,或者流通运输有问题,以至腐败变质,这与没生产有什么区别呢?

6.7 先进技术的追求

不用说,追求先进技术对任何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如我在东南亚的经验一样,在过于热衷引进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时,要充分和慎重地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掉在这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重要问题。

例如,泰国的虾养殖业在这10年内发展到工厂化程度,这是过于相信力争引进高技术,认为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高水准技术是最起作用的。如同在汽车泛滥的社会中仍有大量自行车一样,却没有看到利用天然水域自然生产力的粗放式养殖,在收支上能够确保更大的效益。

中国从古代《养鱼经》以来就有关于淡水养殖许多传统的、优秀的想法和技术。外国的养鱼先进技术不一定总是最完善的,对此需要慎重检查。一个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在发展这种技术的国家的土地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得到推广应用的。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地方,往往不一定是经济上最优秀的。例子很多,尤其是第一产业的情况更是这样。

6.8 “以养为主”和种苗放流

水产养殖业作为主要的渔业发展目标,“以养为主”的方针在1980年上半年就明确提出来了。自古以来,中国具有广阔的淡水面积,淡水养殖生产在世界上占有首位。最近,海水养殖技术的进步在这一方面也起了推动作用,产量剧增。实践证明这方针是正确的,从发展的条件和传统的技术来看,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

日本的淡水养殖面积小,产量还达不到水产总量的2%。现在日本养殖业的目的不是供给动物蛋白,而是在于生产高级鱼,大量的动物蛋白是作为饵料消费的。这与给人民大众提供粮食问题正好是相反。换言之,可以说目标是为了满足人们吃到更加美好东西的欲望,并在市场竞争处于优势的条件下,把追求利润作为目标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日本的技术,从创汇渔业的观点上看是有意义的,但从蛋白供给观点来看,日本的技术不加改造是不太有用的。

当然,应该吸收适合于中国经济条件和发展条件的技术,这一点必须充分考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者,把追求利润作为最高目标,因而忽视消费者利益的倾向性和危险性很大。日本的技术在发展和前进中所受这种影响,必须注意。

举个具体例子说,在养鱼的时候,为了减少疾病死亡率,过去曾使用大量的抗生素(Antibiotics)。多食用这种养殖鱼的人会产生抗药性,因而生病时服用这种药物没有效果。这种医疗上的问题,养殖业者尽管知道,但为了追求利润,对危害大众的事情还是闭着眼睛干,后来因舆论压力才受到限制。

高水平技术,包括最近的遗传工程在内的最新的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的使用,可以收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效果,但也存在许多“陷阱”。例如,一种“外观好,能迎合青年人嗜好和诱发购买意欲,”但营养上是劣质的蔬菜最近成了问题。象这样追求利润,忽视危害的技术发展倾向始终存在,在引进新技术时,一定要慎重考虑。

另一方面,种苗放流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不管是淡水还是海水都非常重要。种苗放流本质上是以人工培育资源为目的,同粮食供给直接有关。但是,在日本称为“栽培渔业”的种苗放流,尽管年年都在进步,要实际上以此代替天然资源生产力的时代在今后的50年内不大可能到来。中国似乎对这方面寄予的期望很大,我想这是因为日中两国在捕捞渔业的资源状态和地理条件上存在差异所引起的。中国方面的期待取决于今后的努力,我想日本这方面的技术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特别是东海、黄海的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关国家应该协力组成共同调查组织。中国和韩国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日、中、韩之间水产技术交流形成的组织化是值得欢迎的。但目前互相介绍各国研究成果的水平还不高,东、黄海水产资源由三国协同调查和研究对策的项目还没有建立,对此我期望能尽早实现。

6.9 淡水渔业生产问题

如文章开头所述那样,中国的内陆水域生产似乎在历史上都是居世界首位的。根据最近统计,内陆水域生产胜过海洋。这样的例子,除了内陆国以外,世界上很少。迄今都认为世界渔业生产大多是海洋渔业,谈到渔业就是指海洋渔业。显然中国在这一点上,具有很不同于一般渔业国的特征。但我觉得中国对淡水渔业调查研究的努力,比海洋渔业还要薄弱,或者说水平比较低。现在虽说对于“渔业研究中海洋渔业研究是中心”的想法正在改变,但是要创建一种能够与迄今为止以海洋渔业为支柱的先进渔业国所建立的渔业生产体系相称的“淡水渔业生产的综合体系”,非中国莫属。最大限度利用河沟、水库、湖泊的天然生产力的增殖技术,在改革开放后是否会受到个人和小集体的利润追求型养殖所抑制?在这一点上,我想还是仍以采用国家建设初期的想法比较好。

6.10 外国种的移植

还有一个问题是移植外国种,移植成长快、抗病害强的种类当然是令人喜欢的事。但是,在日本对这个问题非常慎重。其原因是因为过去有意识地移植外国品种(或者偶然进入,结果还是移植),常常导致生态系的破坏,而造成危害的痛苦经验不少。北美大陆来的一种淡水鳌虾,在稻田的田埂上钻穴,给农民带来很大恐慌。台湾和朝鲜引进的斑鳢把其它的淡水的传统种都吃光,驱除它费了很大力气。现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桂花鱼”(鳊鱼)味美,想要养殖,但因它是凶猛的肉食性鱼,会以压倒优势吃光其它传统淡水鱼,所以研究机关和水族馆严格管理,防止其向野外逃逸。不用说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研究者也在探讨。希望不要发生日本经历过的问题。大胆地试行是重要的,但是同时慎重地探讨也是重要的。

6.11 东、黄海资源问题

众所周知,因为捕捞过度,东海、黄海的资源,特别是底层鱼类资源状况极其恶化。为了改善上述状况,有必要用国际通用的形式进行国际的科学调查研究并采用对策。不幸的是到最近为止采用日中和日韩双边协定处理问题的形式,并不令人满意。

另外,直率地说,想根据协定进行政府间交涉得到国家利益的愿望比较强烈,但是和世界其他类似情况相比,在科学地讨论问题方面不够。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有意义的,它为这一海域经营捕捞业的三国代表会聚一堂提供了可能的基础。日本从事东海、黄海资源研究从1948年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才算有了这样的条件。

尽管如此,三国的技术代表会聚一堂虽已有可能,但还不可能直接解决资源问题,最好是尽早成立正式的三国共同资源调查委员会,开展前述问题的共同调查。

在日本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我有出席两国政府缔结渔业协定会议的经验,并在以后一直连任了五届主席。回顾当时情况是,委员会成立二年后,建立了科学小委员会,分别和本委员会进行详细的资料交换和讨论。坦率地说本委员会是国际政治性组织,换一句话说,就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场所。但科学小委员会每年都向本委员会反映的具体意见,这是世界此类会议的一般做法,北太平洋渔业条约的做法也与此类似。科学委员会可以为实质上解决问题作出贡献,希望能早日实现。

6.12 干部教育问题

我曾经在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国际机构)从事过东南亚各国的水产局干部的培训。其中经验之一是感到水产干部教育存在这样的问题。许多国家大学水产系的教育从开始就只培养候补干部,职工教育是开始就只培养职工。拿船员来说,高级船员教育中不教网的结法和渔网修理方法,也没有实地训练设备,而只是看看挂图,作些简单说明。这样是不能成为知识记在脑子里的。这种想法的背后可能是“那些是一般船员的工作,对高级船员来说并不那么重要。高级船员只是统筹指挥全局”的想法是错误的。作为高级船员必须达到熟练工人的要求,但至少也得通过亲身体会充分了解这些工作的内容。

因此我在高级船员培训工作中,也彻底地进行了下级船员的作业训练。这是因为高级船员在指挥捕捞作业时,如果对渔网修理需要多少时间和劳力都不知道,怎么在生产现场的海洋上进行正确的指挥呢?好不容易发现了鱼群,可却失去了投网的机会,行吗?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许多方面都有同样的问题。

再如,调查研究中,标本采集完全委托学生,教授不监督。经验很少和尚未成熟的学生不一定可以按照正确的操作基准采取标本。研究仪器坏了全部委托别人修理,自己不做工作。对于坏掉的仪器是否修理完善、是否做过零点修正,这类事情如果不关心、不检查,是不能为调查研究得到正确数值的。诸如此类的工作不做,消耗大量经费所得到的宝贵资料的可靠性就不能得到保证。

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各国,现在正在逐年改善。但高级职务船员或者教授做职工和下级职员工作认为是“丧失权威”,“计测仪器的修理不是教授做的”一类想法还没有完全消除。曾有朋友对我诉苦说,他修理仪器时,有人说:“老师不该做象修理之类的下级工作”,我吃了一惊。

我觉得在中国对这样的问题也是充分理解的。我婆婆妈妈地谈了这些,仅供参考。

7 后记

这篇文章没有特定题目,想起什么写什么,内容上也没有什么统一性,只是写了一个日本人(在国外常常说我不象日本人)而且是一个从事水产研究的日本人所回忆起35年前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对于中国水产业现在的一些看法和感想。如能给中国的老朋友们多少提供一些参考,当不胜欣幸。

当然在记述的内容中,少不了有许多记错及误解的地方。但作为我来说,只是想直率地把自己的感想和意见写出来。并不是“好言令色鲜矣仁”,如果不坦率地交换意见,就不可能有相互间的真诚理解。只有双方相互理解才能做到真正的合作。

自1957年来中国访问之后,到最近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出台,我们再次相当了解中国各种实际状况的近30年中,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渔业实际情况是很有限的。坦率地讲,只不过是百分比表示的总产量和一些片断的地区生产量增减比率。

虽说不管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将情报无限制地公开,但如果情报过少的话,技术合作和谈判的对方就会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而产生不安”,以致不管是国际合作项目、国际贸易或者合资企业,都会产生情况与谈判目

标的错位而无法成立。即使有的情报不正确或者与要谈的问题对不上,但有情报也比没有情报要好得多。只要把情报中不完全(或不正确)的地方置于考虑的条件之中,很多谈判还是可能的。如果完全没有情报,就成为“实际情况不明,无法讨论”,而使谈判无法进行。我在海外见到的这样例子举不胜举。

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相互间情报信息交流飞速发展的现状是十分可喜的。相互真诚理解的基础正在形成。因此我坚信这些将成为真正相互友好合作的基础。我已不能象年轻人那样工作了,但仍想鞭答老躯为中国水产事业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衷心祝中国的水产事业蓬勃发展!

1994年11月于日本东京